

地理、历史文化视野中的徽商与晋商

刘文峰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股商人势力特别瞩目,一是徽州商人,简称“徽商”;二是山西、陕西商人,俗称“山陕商人”,简称“西商”或“晋商”。从明中叶至清末,这两股商人势力遍布全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达300多年,对各地的经济、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晋商产生于黄河流域,徽商产生于长江流域。两地的商人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徽商与晋商之共同之处

1.生存条件相似

徽州在长江以南,山西在黄河之东,两地相隔千里,气候、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人多地少,物产匮乏。山高水激,不利于农业生产,粮食奇缺,劳动力过剩,成为徽商产生的自然根源。山西和陕西在历史上也是人多地少,特别是黄土高原、秦岭、太行山区,生态环境差,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五台新志》称:“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

2.兴盛契机相同

徽州和山陕一带的人民经商的历史虽然很早,但形成影响全国经济的商人势力是在明代。明王朝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南犯,从辽东至嘉峪关沿长城一线,驻守了数十万军队。为了解决边防部队的粮饷,明政府一方面让驻军屯田开荒,生产粮食,另一方面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鼓励商人将内地的粮食、草料、衣物、油棉等物资运往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延绥、宁夏、固原、甘州等边塞驻军重地。历史学家称这项政策为“开中法”。“开中法”实施后,山陕商人利用其地理优势,迅速崛起。徽商见山陕商人发了大财,也挟资北上,开赴九边,与山陕商人争夺商权。成为“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务,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与西商并驾齐驱的商界劲旅。

3.民风相似,勤俭致富

山陕和徽州的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人民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徽风俗礼教考》中称当地群众“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簋,贫者盍饭蔬菹而已。”勤俭节约为外出经商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是徽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重要因

素。山陕一带的人民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亦是此地商业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清一统志》引《旧蒲州志》称蒲州一带“民性质朴,好节俭,力田绩纺,尤事商贾。”勤俭节俭不仅是本地山西人民的一种美德,而且成为旅居外地的山西人,特别是山西商人战胜困难,成就事业的法宝。

4.均以儒家所提倡的诚信为商业道德,以义取利

成功的徽商和晋商都十分重视商业道德,把“诚信”作为做人和经商的信条。如徽商黄梅原“言信情忠,游江湖间,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其规时合变,损益盈虚,巧而不贼,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晋商在事业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讲求信义,以勤劳取利,以节俭致富,不欺不骗。即使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种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情愿自己承担金融风险,也要取信于民。

5.经营方式相同,均以同族、同乡作为经营实体,带有宗法性质

徽州既是一个山川秀美的地方,又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地方。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就有不少中原贵族大姓为避战乱,定居这里,形成聚族而居,以重宗法,讲究门第的传统。山西四面环山,相对比较封闭,亦有聚族而居的传统,直至近代在晋南、晋中还可以看到一村一姓的大城堡。所以徽商和西商在经营方式上都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金太史集》卷四《与歙令君书》中称:“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晋商用人有一套“潜规则”,雇员均为本族或本乡之人,外籍人员一律不聘,以便通过监视其家属而达到控制职员的目的。

徽商与西商的不同点

徽商与晋商虽然有许多共同点,但毕竟是两个不同地域的商帮,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特点。

1.活动的地域中心不同

最初的徽商是为解决徽州地区少人多的矛盾而出现的,活动范围一般在江西和浙江两省。明中叶,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开始北上,出现了“走吴、越、楚、蜀、粤、燕、齐之郊,甚则逃而边陲,

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的景象。明成化以后,盐法改革,实行纳银开中的办法,徽商退出了边商的行列。西商则除了垄断供应边塞军民的商品外,还从边商中分化出一部分内商,到两淮、长芦、自贡与徽商争夺食盐市场。万历年间,徽商凭借徽州地理上靠近淮盐集散地扬州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但他们经营的品种较少,而且主要活动在长江流域,而晋商经营的商品种类很多,活动的范围很广。特别是晋中票商兴起后,其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各地,远及俄国、印度、日本、朝鲜等国。

2.经营的商品各有侧重

徽州和山陕虽然都有经商的传统,但在早期都是为满足当地群众的生活需要而经营的,虽然经销的商品比较广泛,但都没有形成规模。明中叶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以经营食盐为主,兼营典当和木材;西商除经营食盐外,还一直作为边商,向边关贩运粮食、棉布、茶叶等大宗商品,并将蒙古和西域的皮毛、马匹贩运到内地。清中叶以后,晋商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经营金融信贷业。从经营品种上讲,晋商除了在食盐上略逊色于徽商外,在粮食、棉布、茶叶等领域的经营规模都超过了徽商。

3.地域文化的特点不同

徽商重儒,晋商重义;徽商以程朱理学大师为旗帜,晋商则以武圣关羽为旗帜。重农抑商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但在徽州和山西等地,由于自然条件不适应农业生产,而形成了重商轻农的思想,甚至重商轻儒的习俗。如《雍正朱批谕旨》中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晋力农,再次者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形成了有利于儒家文化发展的环境。婺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很大。徽州人外出经商发达致富以后,将相当的财力和精力用于文化消费,或研读诗书,提高自身文化修养;或开办学堂书院,培养自己的子弟进入仕途。故而被历代王朝推崇的儒家理学大师朱熹成为徽商的旗帜,程朱理学成为徽商的精神支柱。在安徽会馆中,文昌阁是主要的建筑之一,朱熹成为徽商崇拜的偶像。

西商是一个地域广泛的商人势力,为了维护其共同的利益,他们把儒家所提倡、佛道所接受、广大群众所认可的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而且建立了宣传和强化这种精神的组织形式和崇拜偶像,其组织形式就是具有行会性质和泛宗教性质的山陕会馆,其崇拜偶像就是被民间称为武圣人的关羽。因关羽籍籍山西解州,故山陕商人既把他作为忠义的化身,又把他作为商家的保护神来供奉。在山陕商人修建的山陕会馆中,都有供奉和祭祀关羽的神殿,并将其作为会馆中的主体建筑。这种建筑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歌颂关羽的忠义之举为宗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传说为关羽的磨刀日,六月二十四为关羽的诞辰,各地的山陕会馆,都要祭祀关羽,除隆重的仪式外,演出歌颂关羽忠义事迹的戏曲亦是不可缺少的,故在山陕会馆供奉关羽的正殿对面,必须建有一座装饰考究的戏楼或戏台。在山陕会馆中,以关羽戏曲故事为素材的木雕、石雕、砖雕、泥塑、彩绘随处可见。由此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和山陕商人所信奉和提倡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一致的。

在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上,徽商与晋商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相同处是他们均喜爱戏曲,提供演出场所,资助演出,创办戏班,参与艺术活动。不同点在于:因地域和审美的差异,徽商喜好昆曲、皮黄,创办家班,以私家园林厅堂作为演出场所,满足自己的声色娱乐;晋商喜好家乡的梆子戏,创办字号班,除满足自身娱乐外,还通过商路把梆子戏推广到全国各地。会馆不仅是晋商聚会的场所,也成为当地的公共文化娱乐中心。徽商家班中的艺人与晋商字号班中的艺人有很大不同,徽商家班中的艺人兼具奴婢性质,没有人身自由;晋商字号班中的艺人,属雇傭关系。徽商直接管理家班,晋商则不直接参与戏班活动,由领班管理。

中国社会从农耕社会快速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大变革时期,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满足群众文化娱乐的需求,研究和了解徽商和晋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治优势、地理优势对文学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一代文学宗师的文化行旅,往往伴随文化连锁效应。群体式文学大家的迁徙则必然带来文学的空间流播,促使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产生多维性质的文化交流,甚至为所历之地播撒下文化新生的种子。以蔡邕、阮瑀、王粲为代表的宛州文士群集中出现在汉末,他们流转南北,创作四方,带动了中州与江汉、吴会等地之间的深度文化交流。生长中州的三曹父子自是建安邺下文学辉煌的缔造者。经由曹氏父子的引领,自张衡肇启,由蔡邕光大的清丽华美、任情恣才的创作好尚蔚然而成时代新风。

东汉流寓文士大都集中在洛阳,或仕于东观,或游于太学,或为公卿辟除,多仕于中央政治文化机构。以班固、崔骃、傅毅、王逸等人为代表的流寓文士在京洛的文学活动往往受国家意识支配,他们在中州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国家意志的反映,他们在中州的文学创作与时政变革、文化建设乃至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其作品也借京畿这个典型的文化集萃平台得以快速传播。这一点,正好体现出京畿文学的突出特色——集中反映国家意志,代表文化主流。京畿文学对全国产生较强的带动作用,关键也在于此。

东汉外戚幕府拥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著名文士,他们的身份和文学活动都有明显群体特色。东汉外戚主要来自南阳和西蜀。南阳外戚有阴、樊、邓、何四大家族,他们普遍崇尚内敛谨持的人格,关西外戚马、窦、梁三家子弟却比较外向豪放。幕主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使幕僚集团各具特色,关西外戚幕府皆以关西文士为主,南阳外戚则很少受地域之限;关西外戚选贤以才学为先,南阳外戚则以德望为首;关西幕府多豪放之作,南阳幕府多典雅之文。

汉廷落实取士政策、推行文德教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先京师而后诸夏”,中州人才荟萃,常得风气之先。帝乡南阳则是一政治文化特区。自觉的帝乡意识促使东汉皇帝频频回乡巡视,更使他们在多个层面给予帝乡各种政策支持与人文关怀,帝乡文化现象由此诞生,帝乡文士群也因此快速崛起。

特殊人文环境造就特殊的文化人群,特殊文化人群发挥特殊文化作用。京畿文人对国家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只发生在东汉,其他时代也大体如此。

潮音阁

近日,在南京大众书局里,出现了一批尺度“惹火”的裸体图片展。图片中,两名长发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她们或站在书店里的书架前看书,或者坐在椅子上翻阅,甚至卧读,成为“裸体阅读”的女主角,这批照片也刺激到很多人的“神经”:“亮瞎了,简直不忍直视啊!”书店方面称:“此举确实有博眼球的考虑。”

笔者以为,靠裸体图片展博眼球不过是女色营销。近一段时间女色营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成为一种商业化运作手段。很显然,抛出这种营销手段的目的就是将这个文章做得与众不同以至于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是迎合某种“情趣”不代表提高阅读兴趣。

“裸体阅读”是否能扭转实体书店的困境?或许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读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和人的内心联动,无论“裸体阅读”还是书展上的嫩模写真,满足的是某些人的窥视和自然欲望,对真正的读书人则是一种悲哀。

当然,这种剑走偏锋营销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折射出实体书店经营每况愈下的残酷现实。裸体图片营销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阅读兴趣,这一招是严重走偏了,但实体书店如何创新突围确是一个新问题。

如何提升阅读兴趣?笔者以为,提升阅读体验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实体书店能够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上世纪90年代末家庭影院的出现给电影院带来了很大冲击。当时全国电影院也曾一片萧条,但是现在人们又重新走进电影院,为什么?因为3D电影的出现提升了人们的感官快感,并且电影院的观影感受是无法被取代的。实体书店以后要想发展生存下去道理一样,就是要创造新鲜而丰富的阅读体验,与网络书店错位竞争。譬如,部分书店除了卖书,开始涉足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创意支撑阅读体验的改变,在一些地方,“书餐厅”的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市场环境对实体书店的意义更为重要。如果能有规范的市场环境,实体书店未必就不能与电商竞争。世界上很多国家对电子书商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电子书被归于服务类,所以一直征收的是服务增值税。

实体书店也靠「惹火」突围?

钱兆成

英国税率达20%,德国是19%,法国19.5%,西班牙18%,意大利20%,但印刷版图书属于被保护行业,所以税率减免,英国只有5%,法国5.5%,德国7%,西班牙4.5%,意大利4%。此外新书上市都有一段保护期,即新书在实体书店销售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在网上销售。国内在保护实体书店方面整体上做得还远远不够。近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在联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针对实体书店的相关扶持政策,让人看到一片亮色。

当然,最关键问题,还是扭转读书观念。不久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的读书风气制约着人们阅读品质的提升。不矫正国人浮躁的读书观念,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一样,也难以走高、走远。

观点摘编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重点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注重物质层面的分析转向注重社会层面的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变迁及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转向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从以生态和经济变迁为中心转向着重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从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转向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工具。总之,环境史越来越接近社会文化史。这一范式转换,被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怀特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作

为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带来了环境史研究的繁荣,环境史开始融入并影响美国史学的主流。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环境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克服美国早期环境史研究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促进了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并推动环境史融于并引导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环境史研究在特定领域的特色。

摘自:高国荣《近二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原载于《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中国美术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

目前中美美术交流的格局仍然是不平衡的,中国引进介绍西方美术多,向外传播中国美术少,存在很大的“文化逆差”。外国人一般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比较熟悉,而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却相当陌生,对当代中国美术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2009年“中国美术世界行·版画展”在奥地利维也纳青年美术馆展出时,该馆馆长克拉玛说:“随着世界各国的发展,目前西方人最热衷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国家已经不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而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因为奥地利人最向往了解的国度。”

特殊人文环境造就特殊的文化人群,特殊文化人群发挥特殊文化作用。京畿文人对国家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只发生在东汉,其他时代也大体如此。

办个展已较为普遍,但这些个展仍属于散兵游勇式的个人行为,还不足以形成集群的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不足以代表当代中国美术的整体面貌、主流形态和国家形象。因此,遵循中国美术家协会倡导的“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的核心理念,“中国美术世界行”举办的国家级的群体展览,不仅有助于平衡中美美术交流的文化逆差,而且足以代表当代中国美术的整体面貌、主流形态和国家形象,让外国观众看到更全面、更真实、更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中国。

摘自:王镛《中国美术世界行——当代中外美术交流之旅》,原载于2013年10月19日《美术报》

(杨晓华 摘编)

史海拾贝

京畿文人群体与文学主潮

刘德杰

东汉建都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成为京畿之地。历史上,京畿文化精英往往是国家主流意识的代表,他们是否作为、怎样作为,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东汉中文文人群体就引领了一代主流文学的发展。

东汉的“中州文人”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汉安帝以后崛起的中州本土文士群,南阳刘珍、南阳张衡、陈留蔡邕,谁县曹操都是一代宗师,他们引领了汉魏文学主潮;二是以杜笃、班固、傅毅、崔骃等为代表的流寓文士,他们是东汉前60年间最富有创作活力的文学家;三是皇室文人,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灵帝、东平王刘苍、和帝邓皇后等都博学好文,尊崇经学,器重文学之士,借重于政治文化制导权运转全局,通过文学取士制度干预国家文学发展的方向。

文学发展既需要长期的积淀,也需要良好的发展机遇。京畿之地为东汉中文文士提供了快速成长的适宜环境,也为他们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东汉中文文坛上,率先崛起的是来自南阳、生活在洛阳的皇族文学力量。光武帝刘秀为皇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经学教育规划,培养了文德并修的良好家风,这是东汉皇族文化辈出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皇帝诏书绝大多数由文臣代笔,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明帝马后、和熹皇后等人却经常亲自撰作诏令。这些政令文依照儒家经义立意,博征“六经七纬”之文,颇具个性色彩。光武帝的自作诏恢弘大气、随性自然,抒情时一往情深,训导时循循善诱,叱咤时则语气凌厉。汉明帝的自作诏简约严明,一如他严厉果决的行事风格。汉章帝的自作诏最富人情味、情意醇厚,节奏舒缓,俨然宽厚仁慈的长者。明帝马后和熹皇后后的自作诏则富有母性特征,情感细腻,娓娓道来,如对面而语。东平王刘苍、沛王刘辅、临邑侯刘复、宗室子弟刘毅、刘珍等,也都积极参与国家礼乐文化建设,撰写了不少经典性奏疏、史传及赋颂,刘苍议论宗庙礼仪的

奏议被誉为“一代典章”。东汉皇族以身作则,推崇经学,雅好文章,无形中提升了“文”的地位,强化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也为文坛树立了榜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称赞他们对当世文坛影响宏巨,说是“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皇权时代,帝王的文化好尚、文化思想会对国家文化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光武帝和汉明帝早年“颇略文华”,朝中文才匮乏。永平后期,明帝开始广泛征召文学名士进入东观(设在南宮的国家图书馆),著作国史,整理典籍,还亲自组织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如令百官创作《神雀赋》,这些举措促进了文学良性发展。汉章帝“左右艺文”,推行文化平衡发展战略,既以“经明行修”取士,又开“文学取士”之路,把士大夫阶层的文学修养纳入执政能力考核,促使世家大族开始普遍重视文学教育。汉灵帝爱好新奇俗丽之文,以俗文艺取士,加速了汉末文学从渊雅深厚向通俗浅丽的转变。

继皇族而起是“攀龙附凤”的帝乡文化家族。南阳是光武帝故乡,也是功臣和外戚集中之地。帝乡文化家族如邓禹家族、贾复家族、李通家族、张衡家族、樊准家族等,多以功勋起家,转而修文,成功实现了文化转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接受过系统的经学教育,文韬武略,他的“河北进策”是光武帝开国立基的纲领,朱熹将其与诸葛亮“隆中对”相提并论(《朱子语类》卷135)。邓禹家族注重文德教育,人才辈出,累世宠贵,史学家范晔誉之为“可为后世法”。临朝执政十几年的和熹邓后即邓禹之孙,东观文士邓闳、蜀汉外交家邓芝都是邓禹之后。帝乡文学发达,名家云集,名作如海。樊准的《请兴儒学疏》被清康熙帝赞为“匡时之论”,左雄的奏议“台阁为式”,刘珍主纂的《东观汉记》为史学名著,出身皇族的刘毅和刘駒擅长史传赋颂,延笃与朱穆则是为蔡邕所仰慕的桓帝朝文坛领军人物,张衡的《四愁诗》、《京京赋》、《归田赋》皆凌轳一代,烛照千古,肇启晋文学“清风”。

整体上看,东汉中州文学史上,功臣家族要先人一步,从郡国士人发展起来的文学家稍晚一些,多在章帝、和帝之际。起步较早的是汝南(今属驻马店市)家族群,成名于汉末却光耀于魏晋的是颍川(今属许昌市)家族群,陈留(今开封)的边助、边让、蔡质、蔡邕、蔡文姬、阮瑀则是桓、灵、献时代的文学大腕。

汝南文学家群凭借“经学优势”捷足先登,多出帝师。郗恽谙熟经学讖纬,为光武帝所赏识,拜为太子太傅,以《韩诗》教授(度)太子刘强。郗恽之子郗寿“明达有文章”,章帝特赐“汉文剑”予以褒奖。袁安家族兴起于明、章之际,以“易学”传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四海,诸侯盟主袁绍、曹操帐下的文学家袁涣都是袁安之后。应劭家族在汉魏间以文学著称,七世通显,名扬天下,应瑒位列“建安七子”,与王粲、阮瑀等并驾齐驱。

颍川文学家家族发达于汉末,他们的奠基者几乎都是通过“经明行修”的察举征辟之路,从郡县吏登上政治文化前台。汉魏之际,颍川文学家家族得风气之先,由儒转法,成为汉魏文化转型的先锋。荀彧家族、陈群家族、钟浩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颍川荀氏是荀子之后,安帝时的荀爽是开基祖。荀爽有八个儿子,英才俊爽,时人谓之“荀氏八龙”。荀彧、荀攸、荀昱都是曹操帐下奇谋之士,荀悦则是汉献帝身边的鸿儒文彦,以《前汉纪》和《申鉴》彪炳千古。颍川陈寔与党人领袖李膺、陈蕃齐名,兼通经学、讖纬及杂学,他的《异闻记》是早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陈寔祖孙(陈寔、陈纪、陈群)从经讖杂学至于刑名之学,自袁小吏逐级升迁,官至三公,成为汉魏易代之际自平民成长为门阀的士族代表。颍川钟浩以刑律起家,其孙钟繇为书法名家,繇子钟毓与钟会都是魏晋名士,以刑法、书法、文学、玄学著称于世。颍川文化家族突出的群体特征是应时达变,骋才济世,声隆于魏晋。

中州各地文化家族的崛起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和地理次序:帝城皇族→帝乡南阳→京都临近诸郡。这说明:政